

窥海斋 林少华专栏

倪萍的姥姥和我的姥姥

想起姥姥所在的老屋、灯光,想起遥远的故乡和亲人……



林少华,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亦从事文学创作。现为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著有《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落花之美》、《乡愁与良知》、《为了灵魂的自由》。译为《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日本名家之作凡五十余种。

也许是因为倪萍是青岛人而我现在是青岛市民的关系,我看了她的《姥姥语录》。不过,较之姥姥口中的有声语录——尽管那些语录都很好——更让我感动的是姥姥身上的语录,也就是她对小倪萍无声的关爱。

比如鸡蛋。倪萍小时候正是上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树上的榆树叶都被别人吃光了”。她也严重营养不良,两岁了还站不稳,罗圈腿,几缕鸡蛋黄一般黄的头发贴在大脑门上,“连笑都不会”。于是姥姥把“我”从青岛机关幼儿园接到乡下,把村里但凡能借的鸡蛋都借来了,后来又用从娘家带来的一副银手镯换来一炕鸡蛋。姥姥感叹:“鸡蛋真是个好东西,才吃了不到一把(十个),小外孙女就会笑了。”从此鸡蛋不断,吃得不倪萍不但会笑,而且个头猛长。用姥姥的话说,噌噌地往上长,夜里静的时候她都能听见“我”的骨头嘎嘣嘎嘣伸展着。

另一个感人细节也和鸡蛋有关。小倪萍做梦都想得到红头绳,货郎每次进村,她总是盯住红头绳的头绳不放,而姥姥手头一分钱也没有,好话说了好多次也没买。“姥姥终于给我买了,是用四个鸡蛋换

的。姥姥苦苦央求货郎,可人家不要鸡蛋……从村东头说到村西头,红头绳终于说回来,不懂事的我臭美得满村飞。”

小外孙女站不起来时用手镯换鸡蛋,想扎红头绳时又用鸡蛋换红头绳——多好的姥姥啊!

不由得想起我的姥姥。我的姥姥也住在乡下。姥爷去世很早,姥姥同过继的儿子(姥爷弟弟的儿子)一起生活。我小时候,姥姥每年深秋都来我家一次,帮母亲一针一线做一家老小的棉衣,棉鞋和拆洗被褥。后来姥姥年纪大了,母亲就打发上小学的和弟弟放暑假时去看她。我和弟弟先坐半小时火车到县城,买二斤蛋糕提了,出了县城往北走三四十里宽窄窄的土路,到姥姥家时已是黄昏时分了。住几天要走了,姥姥不放心我和弟弟走那么远的路,就叫我们搭村里进城的马车回去。动身的时候天还没亮,一川冷风,满天星斗,整座村庄只亮着一盏煤油灯。姥姥用一块布包几个煮鸡蛋叫我们带上,找两捆干草铺在马车中间让我们并排坐好。车走的时候,我和弟弟脸朝前看着,看那亮灯的窗口,看窗口前姥姥矮小的身影。马车跑得快,出村跑上南岭庄稼地坡路了,姥姥仍没回屋,就那

样站在窗口灯光下一动不动朝马车这边望着。灯光越来越暗,姥姥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身影模糊了,只剩下豆粒大的灯光固执地守在远处……

记忆中我的姥姥没有留下语录。能确切记得的,只有一句话。那是我上初中的时候,一次单独去姥姥家。一天偏午,我“吱扭”一声推开堂屋后墙那扇开裂的厚木板门,去后面的小院子摘几粒红得像红露水珠一样的樱桃投进嘴里,回来歪在姥姥身边看书。午后的阳光明晃晃照在高粱秆编的炕席上。舅舅下地干活了,两个表姐不在家。姥姥把几块碎布头铺在炕席上,拿出针线篓,叫我帮她把线穿进针眼,然后像怕人听见似的在我耳边说:“给你做件棉坎肩。”姥姥略一停顿,“不是为你,是为我闺女啊!”说完,她抬起眼睛,眯缝着像是往远处看,一副凄凉的神情。姥姥只有一个闺女,就是我母亲。而我母亲出嫁后日子过得又苦,六个小孩,八口之家,全靠我父亲四十七块工资过活。父亲又长期在外地工作,家里家外全靠母亲一人操持。日子过得最苦的时候,母亲甚至冬天穿不上棉裤,夏天找不出去去看姥姥穿的不带补丁的单裤——姥姥

能不心疼这个唯一的女儿吗?腿脚可以走远路的时候还能去女儿家帮忙,而今母女相聚都不容易,只能悄悄地——我猜想姥姥不愿意让并非亲生儿子的我的舅舅和两个比我大不多的表姐知道——给我做件棉坎肩来减轻女儿的负担。姥姥当然喜欢我,疼我,但这显然是因为我是她女儿的儿子。当然,这些都是我日后一点点体会出来的。

那时候已开始有人穿毛衣毛坎肩了,但我家穷,买不起毛线,因此那件棉坎肩几乎是我身上除了棉衣之外唯一可以挡风保暖的。我穿了许多年,上大学还穿着。姥姥临终的时候,舅舅为了不让身体不好的母亲奔波痛苦而没有告诉她。我知道是放假回家以后,我穿着姥姥做的棉坎肩,独自走到小仓房山墙拐角那里,朝姥姥生活和去世的方向深深鞠躬,默默流泪……

话说回来,《姥姥语录》现在所以卖得那么火,倪萍的知名度固然是个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实质上她写的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姥姥。或者说她笔下的姥姥让我们每个人想起自己的姥姥,想起姥姥所在的老屋、灯光,想起遥远的故乡和亲人……

英国纪行 徐宏力专栏

想吃苏格兰打卤面



徐宏力,博士,教授,青岛大学副校长,青岛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从事美学与国学研究。

2010年岁末,国务院侨办组织第六批国内专家讲学团,赴英巡回培训华文教师,我随队到了苏格兰的格拉斯哥,爱丁堡,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英格兰的曼彻斯特,利物浦与伯明翰,最后从伦敦离境。回来后把一路微博式的笔记堆砌起来,不连贯的地方交给读者自己填空,于是就有了这篇长而散的随笔。

少帅胡子兵,我们团长是未婚青年,80后,姓蔡,我们叫他“菜团”,此人勤快,精干,谦恭,有些理想化,他的判断句常常不是“如何”,而是“应该如何”,名为团长,实为人民公仆,一路琐事都由他打理,既尽心也尽力。北师大的马教授是资深语言学家,女性,随和,见识广,熟悉名牌服饰,广西高校的胡老师是民乐家,男高音,有艺术气质,说话很讲究气流的运动轨迹。我,青大学人,冷面,自信,上课时经常用食指戳点说事。

马教授曾指出出差在外的先生买鞋,颜色、款式、号码、品牌都对,但拿回来一看,不是想象的效果。要素正确,不等于结构合理。国侨办组织的讲学班子是绝配,整体大于局部之和。我的国学课沉重,累了的学生听听胡老师的男高音,便放松了。正当大家觉得逻辑与审美有些遥远时,马教授的汉语教法课回到当下,因实用而使学员受益。

作为业内专家,马教授熟悉出国

培训的事。她说,到老挝去是个苦活,国家穷了很无奈,飞机上跑道都用牛车拉。俄罗斯也不理想,那么大的能源国,冬天暖气放得很晚,睡觉时只好把家具压到被子上。印尼不安全,多数时间缩在宾馆里,怕被心术不正的人盯上。“菜团”插嘴:那儿的海关特黑。说着用手比划点票子的动作。我听后觉得幸运,毕竟是去发达国家,但是一读到赴英注意事项,便觉得有些惶恐。上面说听到枪声要立刻卧倒,看来恐怖主义挺恐怖的。文字中还写着,遇到警察一定要把手放到其视线之内,于是我就开始研究正确姿势,放到前面,后面的警察看不到,放到后面,前面的警察看不到,只有双手高高举起才不妨碍四面八方的视线,我照着镜子试了几次,怎么打量都不像革命意志坚定的人。

我在英国的行动原则就是紧紧瞄住领导,到哪儿,怎么去,自己不但心里没数,而且充耳不闻,除了讲课,就是跟着走,这是最洒脱的办法。跟定领导没错,错了也是领导的错,要改是他的事,我依然跟着,没脑子,有福气的。当然,首先要看清谁是真领导,工作上的事听“菜团”的,买东西的事听马教授的,有时当地接待人员最明白,领导就是他们了。由于我跟得最紧,所以一次也没走失,连“菜团”都迷过路。关于这经验,我给大家讲了个故事。某企业主雇了些残疾人,一



方面为了积德,一方面为了减税,除此之外,还有大用。当时公司被债务拖累得不轻,老板就领着智障员工前去讨钱,指着欠债人说,今天中午他管饭,说完抽身便走,结果智障人士像膏药一样贴住对方,走到哪儿盯到哪儿,连如厕都不放过,甩都甩不掉,老赖们没有不服的,最后都乖乖还了钱。人人是人才,关键在于放到什么岗位上。这个比方不太恰当,但是紧跟的做法还是可以借鉴的。

在英国,吃饭最不称心。我本杂食者,是人吃的东西我都吃。但西餐实在不敢恭维,只有炸薯条还不错,与中国的酸辣土豆丝相比,一软一硬,“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到达苏格兰的当天,陪同人员问我们想吃什么,我说“苏格兰打卤面”,人们大笑,这个真没有,是“小沈阳”胡说的。一路上接待我们的大多是香港华侨,所以常吃粤菜,我在国内接触过,但没那么浓烈,英国的粤菜馆大概要吸引

当地人,所以菜做得并不秀气。回国以后前几天,我充分享受了顺口的小米粥咸菜,吃得平和,压住了心火。后来又进食猪耳朵,猪蹄子,猪尾巴棍儿什么的,都是神经末梢食品,吃啥补啥,神经末梢强健了,中枢神经一定发达,人会变得聪明起来。

倒时差是大问题,到了英国朝西倒,回到中国朝东倒,我常半夜就醒,前半夜睡的是英国觉,后半夜睡的是中国觉,南辕北辙,颠三倒四,抵抗力下降。从伦敦带回了感冒,外国症状,国药疗效不好,于是大病了一场。节奏是生命内核,音乐没有节奏就没有旋律,生命没有节奏就没有活力。节奏表现在变化与重复中,从醒到睡,从睡到醒,既是变化也是重复,该睡的节点找不到,该醒的节点也就消失了。无序坏了情绪,有一种人生没被自己掌控的感觉,浮躁之苦,感同身受。我只漂泊了几十天,华侨们,几十年。

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

被遗忘的时光

这种模糊的史前文明断片,总是时不时跃出一点,将我固有的知识全部打乱。



韩松落,西北人,居河北,写专栏,做小说,看电影,用文字使生命纹路繁密,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

最早看到的香港电影,或者说,我最早看到的电影,是《画皮》和《白发魔女传》。

1979年,朱虹版《画皮》在内地上映,1981年,鲍起静版《白发魔女传》在内地上映,两部影片都打着“内部电影”旗号。不过,上世纪80年代前的“内部电影”,是结结实实的限制,必须一定级别一定单位才可以观看,1980年以后的“内部电影”,却不是限制,更接近于广告。于是,新疆南部的露天电影院,满天繁星之下,我看到了鲍起静,那是让孩子都震动的美,我甚至牢牢记住了担任配角的刘雪华,对她的印象深刻到,数年后在琼瑶电视剧里看见她,仍能一眼认出她来。上世纪80年代,影像经验少得惊人,任何一部电影,都

像一块难得吃到的糖,糖吃光了,还得在脑子里多舔它几遍。

隔了二十几年,找到《白发魔女传》,却赫然发现,这电影即便搬到上世纪80年代的内地武侠片堆里,也看不出什么异样,片头那首由一把琵琶的“民族唱法”男声唱出的主题歌,演唱者竟是郁钧剑,再追溯下去又发现,1979年,香港的唱片公司曾经为他出版过《郁钧剑歌曲精选》录音带。

随后又看到一本《朱虹画传》,写她在昆明的生活,她拍《金鹰》,如何在塞北体验生活,最让我意外的,是她甚至出演过阿庆嫂!这些碎片,和长城,凤凰公司那些已成碎片的往事搅拌在一起,怎么也拼凑不出那条线索的完整面貌。我所知道的“香港

电影”,只是邵氏、嘉禾、张家班、香港电影新浪潮,对狄龙、姜大卫、李菁们的事迹,我已经熟悉到,略有眼生的字句跳出来,都觉得不适的地步,而她们——鲍起静,朱虹,以及长城、凤凰的史前,却在湮灭之中,渐渐像史前文明一样,模糊,混沌。

这种模糊的史前文明断片,总是时不时跃出一点,将我固有的知识全部打乱。我年长些的朋友曾告诉我,上世纪60年代,内地也曾有过短暂的思想活跃时期,琼瑶小说刚在台湾出版,内地就曾引进并引起轰动,甚至导致大批少女离家出走,让媒体炮制出“琼瑶公害”这样一个词语。但我四处搜索资料,却也找不到他说的这段掌故,怀疑他只是以讹传讹。现代社会,刚刚真实发

生过的事,就像死海古卷一般支离破碎,得托赖口口相传,在经验传递的过程中慢慢走样,以至于最后成了集体创作,直如一部《格萨尔王传》,也真是奇事。

然而,也不奇。他们缺人声张。担任声张者的,通常有两种人,一种是后人,一种是痴魂附体的爱好者,但不论哪种声张者,都得依赖时势,时势要你声张,你的声张方才有效,最近获得声张资格的“民国女子”、“民国男子”,大概妙在远,可以任意打扮,供人寄寓生活理想、社会理想、人格理想,而四十年左右这段公案,却显然不讨欢心,不免成了一段尴尬的历史,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美,也是白美,努力,也是白努力,天亮之前,不认何止三次。

编辑:孔昕

美编:马晓迪